

※ 學界消息 ※

最高處的燈塔：敬悼張亨老師

廖肇亨*

如今想來，張亨老師思想史課後的研究室，或許是我在臺大中文系四年最愉快的時光。

當年的中文系，大四時只剩下思想史與訓詁學兩門必修課。其實同學們在大三下學期都很興奮，因為終於可以上到張亨老師的思想史，對於必修課，大多數中文系學生莫不戰戰兢兢，如履薄冰。報以歡欣鼓舞、期待翹首的必修課，在我印象中，除了張亨老師的思想史之外，幾乎絕無僅有。

在此之前，我對張亨老師最深的印象是〈論語論詩〉那篇論文，此文對我們那個年代的學生影響極其深遠，思想史論文原來可以這樣寫。以現在的眼光看，此文兼具跨領域的視角與方法架構，有思想，有文彩。後來我總覺得，張老師其實在此文中寄託了他對臺大中文系師長們的無限景慕，並嘗試對他的成長歷程加以總括。不過，當年未必能懂這些，只是覺得文章真好，什麼時候我們也能做到這個地步？

第一次上課才有機會看到張亨老師，其實當年老師也不過五十出頭，那時已滿頭華髮，在他高大挺拔的身上煞是好看。當時我雖然滿腦子想要研究文學批評，但是已遍讀佛典，大概除了《華嚴經》以外，一般的佛典多已經眼，那時印順導師的《中國禪宗史》對我有一種致命的吸引力。所以當老師講出「佛教我不懂，你們要自求多福」的時候，從此在我腦海留下無法磨滅的印象。但這一點也不重要，說實話，老師講課的內容我都不記得了，只記得每次上課聽老師分析思想家的內容好精彩，深恐錯過任何一字，恐怕我當時也未必很能接上老師的思緒，我唯一能確定的是：「研究文學批評，一定要有思想史的根底。」老師在課後曾經跟我這麼說，現在我也常把這句話送給有志文論研究的年輕朋友。

* 廖肇亨，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研究員。

相對於課室的內容，課後在老師研究室的討論更令人懷念，差不多每週都去，歷史系的宋家復、外文系的朱偉誠也常在。有一次鍾彩鈞老師來看老師，老師說鍾先生的求學歷程很特別。當時老師在學校的演講，我們也差不多每場都到，李隆獻主任跟我說，張亨老師跟他們班特別投緣，我有點不服氣，其實我們這個年輩跟老師的親近，李隆獻主任當然不會知道。

我的老同學徐聖心教授思緒精深，極獲老師青眼，對於新儒家唐、牟諸公都有甚深造詣，以前在老師研究室的談論，此是重點之一。此固非吾志之所在，故我好像早早就離開那裏，遁入東瀛學者的淵藪當中，除了文論之外，碩士班我都在似懂非懂地苦啃荒木見悟先生的著作，生命隱隱然將打開另一個方向，碩士階段我幾乎不再出入老師的研究室，彷彿在另一個星球經營新軌道。好幾年我可能也怕見到老師，多少覺得我沒有在思想史上進一步用功，見到老師還是有點慚愧，雖然在學校碰面時，基本的規矩還是有的。

一直到碩士口考當天，似乎才又有機會聽到老師的訓勉。當年碩論寫四年雖然很平常，但是有五個委員坐鎮還是希罕的。除了指導教授吳宏一老師外，校外委員分別是羅宗濤老師、戴璉璋老師，校內委員則是張亨老師與古清美老師。從九點考到下午一點半，還分上下半場，據說創下當年中文系碩論口考最長紀錄，但我最在意的還是張亨老師的看法。

我知道我的路數跟老師不合，但老師一開口就表示這是他看過最好的碩士論文（當下沒有說「之一」，我記得很清楚），而且發言最久的人就是張亨老師，當下我忍住眼淚不掉，老師畢竟還是認可我在學術研究的努力與功力。我還記得他說：「你的論文最好的地方不是資料豐富難得，而是不斷深入思考問題的態度。」碩論口考問答分上下半場，將近五個小時，末尾已近閒談，老師得知我當時有意申請日本留學，當下主動表示他願意幫我寫推薦信。在我心中，老師壁立千仞，宮牆巍峨，實是絕大恩寵。後來我鼓足勇氣向老師提及此事時，他第二天就交到我手上，我赴東京大學的推薦信，其一出自張亨老師的手筆，每一思及，泫然良久。

碩論口考之後，老師好像不再那麼遙遠可怖，那時我已經知道鄭清茂老師與張亨老師情同手足，在我離開臺大前一年，鄭清茂老師在臺大中文系客座，鄭老師是我決定留學日本最重要的契機。不知道何時開始，我好像就會跟兩位老師一起吃飯，有時也在一旁看他們開開無傷大雅的玩笑。鄭老師最常說的笑話就是臺靜農先生每以龍鬚筆之為物，實為豬鬃一事為例，調侃理學家，這時候張亨老師就會無奈

地笑一笑。張老師與古老師後來知道我在荒木見悟先生的著作下過功夫，都一再表示對於中譯本的殷切期盼。對我而言，翻譯荒木見悟先生的著作宛如回覆臺大老師們交代的功課，希望成果不會辜負他們在天之靈。

張亨老師全然是個學院中人，但絕不迂腐，對於時代變遷的軌跡與得失，其實動若觀火，在國文課本中減少政治汙染，加重白話文的比例，出自張亨老師的主張，前人於此言之已詳。他的胸襟極其寬廣，例如錢新祖先生在臺大歷史系開中國思想史，他也鼓勵同學前往聽講，彼此參照，後來我也在學院工作，才知道這有多麼不容易。在我心中，老師就是個真誠儒者，雖然溫厚，但卻嫉惡如仇。雖然我一心都在佛教，離儒學越來越遠，後來才發現老師於此倒也鼓勵有加，我才稍稍安心。

赴日讀書第二年，有一天我突然接到楊儒賓老師打來的電話，原來他到東京大學訪學前，張亨老師說有一個學生（就是我）在東京讀書，要他跟我聯絡。在此以前，我和楊老師並不熟稔，雖然我聽過他的報告，但好像沒有正式談話。楊老師在東京大學時，他說他的任務是要把《日本儒林叢書》讀完，我們常在東大赤門前的居酒屋一同吃飯，有一兩次林文月老師到東京時作東也把楊儒賓老師找上，對留學生而言，一邊吃飯一邊論學，樂復何求。唯一可惜的是：我在東京大學當留學生的時候，幾乎等於臺灣中文學界駐東京辦事處，招待臺灣來的學者不計其數（當然都是老師們出錢請我吃飯），但從來沒有在東京接待過張亨老師。我想，以老師的個性，他到東京恐怕也不會讓我知道。後來，印象中跟老師吃飯談話的時光中，多數都有其他的師友在場，記憶最多的是鄭清茂老師，還有林順夫老師從美國回來的時候，幾乎就會有一場飯局。然而，出身鄒魯衣冠之地的老師畢竟還是粹然儒者，談笑間總還是有節度的。更重要的是：張亨老師絕不讓學生請客，飯局之間總是早便搶著付帳。一直到最後，竟沒有機會請老師吃上一頓飯。

張亨老師上承臺靜農、屈萬里、戴君仁諸先生的斯文遺緒，下啟臺大中文系為首的臺灣中國思想史研究之風。先生一生學問，凝為《思文論集：儒道思想的現代詮釋》一書，然其厚積薄發，無言之化更倍於斯也。張亨老師的離世，象徵一個時代的結束。但張亨老師高大的身影，確實曾是我們一代人追索智慧過程中最重要的燈塔，指引不同航道的追尋，每當我們各自航行，莫不慶幸盲動的青春歲月，曾經有過來自最高處燈塔那光亮的指引。高大、堅毅、溫暖，而且充滿智慧。

謹以此文，敬悼張亨老師，以及一個追尋理想永不止息的年代。

